

第一棵茶树的文化意义

张经武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厦门 361005)

没有茶树，也就无所谓茶叶、无所谓茶文化。茶文化之源，不是陆羽之《茶经》，不是唐人饮茶之习俗，而是神农氏尝百草发现第一棵茶树之传说。《神农本草经》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陆羽《茶经》提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先民古老的传说虽然有夸张虚构之处，但“学者们对传说特质的认知有两个侧重，一是作为标志物的客观的实存，一是作为态度和感受的主观的相信”^[1]。神农氏发现茶树和茶叶尽管是传说，无从考证。但这至少传递了一种客观历史真实，那就是中国先民早在文字不可考的口传文明时代就发现了茶树和茶叶，就将茶树从众多其它野生树种中分辨了出来，还知晓了茶叶的药用价值。

神农氏之所以被尊称为“茶祖”，就在于在传说中，他发现了第一棵茶树，知晓了茶叶之药用价值。“发现了茶树”，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在此之前，自然界显然也有茶树。“根据植物学家估计，山茶属植物的出现，大约是在距今四千万年之间的第三纪渐新世。茶树种群的起源时间，比人类出现的时间早了数千万年以上”^[2]。但在神农之前，早就在自然界存在的茶树淹没在众多植物之中，没有人知道，更无人理解，甚至还未获得命名，它对于人类的意义只是处于一种潜在状态，等待着发现和利用。神农氏发现了茶树，第一次将茶树从万千其它植物中分离出来，让茶树从亿万斯年的沉默状态一下子走进了人类的视野。此后，野生茶树才有了被人工种植的可能。“知晓了茶叶之药用价值”，这一认识同样宣告了茶叶新时代的到来。从此以后人们对茶树和茶叶另眼相看，从此野生茶树成为稀罕之物，从此野生茶树成为人类利用或破坏的对象。而茶叶药用价值的利用又直接催生了人类生活新习惯的诞生——饮茶，以茶入药特别是随后饮茶习惯的形成，使野生茶树资源被过度利用直至濒临稀缺，这导致茶叶人工种植的出现和大发展。

茶叶从野生到人工种植，这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巨大成就。要完成这一过程，必须有动因。动因就在于人们对茶叶药用价值的利用，在对其药用价值的利用中渐渐形成饮茶习俗。药用价值及生活需要使野生茶叶的有限和人们日渐增加

的需要形成矛盾，促使了人工种植茶叶的诞生，促进了人工种植茶叶规模的扩大。如果说药用价值利用还只是促使了茶树小规模和小范围的人工种植，那么日常饮用需要则成为茶树大规模种植的根本动因。

茶树从野生到人工种植，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举，其意义可和驯化猪牛羊鸡鸭鹅相当。这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体现了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体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从此以后，种茶、采茶、制茶、饮茶成为一个完整系统，茶文化的基本体系也由此形成。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茶树种植是茶文化之基。

事实先于记载，这是历史无数次证明的一个简单道理。“我国古籍中对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一般都是晚于现实，低于现实的，从它们的产生到见诸记载，往往要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古籍中关于某项茶树栽培技术的最早记载，并不是这项技术形成和产生的最早年代；不是源，而是流，只能作为当时社会所达到的水平的一种根据”^[3]。我国有关茶树种植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魏晋时期，西晋《广志》：“茶，丛生”；东晋郭璞《尔雅》苦茶注：“树小如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桐君录》（原书佚，约成书于5世纪）：“茶花状似子，其色稍白”；《述异记》（传说为梁代僧祐著）：“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魏王花木志》（据考，可能是后魏元欣撰，原书佚）：“茶，叶似子，可煮为饮”。这些记载并不表明从魏晋时期开始人们才种茶饮茶，它恰恰说明早在魏晋以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就有人类的种茶和饮茶活动。到唐代陆羽之《茶经》，“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子，花如白蔷薇，实如饼调，蒂如丁香，根如胡桃。”陆羽从整体说到局部，从花叶一直说到种子、根、茎，完成了前代许多学者几百年要说而没有说完整的茶树形态问题。陆羽的贡献在于把先辈的茶文化和前代学者对茶的研究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总结。有学者根据陆羽《茶经》得出中国人自唐代开始种茶饮茶真是武断至极。

作者简介：张经武（1974—），男，湖北黄冈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专业2013级在读博士，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茶文化等。

霞浦县茶叶发展历史概况

樊成钢, 邓笑陀

(霞浦县茶叶技术推广站 355100)

摘要:霞浦县为闽东最早的县,产茶历史悠久,茶文化渊源流长。本文从公元282年霞浦设立温麻县开始,经唐朝、明朝、清朝、民国,到1949年解放前夕,叙述了霞浦县茶叶发展的历史。

关键词:茶叶;发展;历史

霞浦县位于福建省东北沿海,纬度 $26^{\circ}25' \sim 27^{\circ}07'$,东经 $119^{\circ}46' \sim 120^{\circ}28'$ 之间,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常年受到海洋性气候的调节,冬暖夏凉,春早秋迟,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光照长,积温高,年平均气温 18.5°C ,平均日照数为1899.2小时,太阳辐射总量为 105.526 千卡/平方厘米。年平均降水量在 $1100 \sim 1800$ 毫米之间,平均相对湿度为80%,pH值 $4 \sim 6.5$ 之间,是海阔山多的沿海丘陵区。全县优良茶区分布在 $500 \sim 800$ 米之间,高产茶多在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是茶叶宜种植栽培地区。

霞浦县产茶历史悠久,茶文化渊源流长。三国时吴国就在霞浦设温麻船屯,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设立温麻县,为闽东最早的县邑。霞浦先民依靠造船业发达、海上交通方便的优势,最先从苏、浙引进茶叶生产技术,开始了种茶、制茶、饮茶。从霞浦古县村(晋代温麻县治址)龙泉山、眉头山挖掘出土的晋代、南朝时期的三足炉、托杯、五盅盘等文物均为茶器,揭示霞浦先民在晋代以前已有饮茶习俗。相传晋代道教理论家、医药家,中国道教丹鼎派最重要的倡导人之一葛洪曾在霞浦县葛洪山洞传道、炼丹,传说葛洪炼丹需要把茶树的叶子煮熟凉干研末,掺入草药一起炼成丹丸,为当地群众治病。现葛洪山洞尚有石屏、石几、篆文等遗存。

我国茶树种植栽培的具体操作性记载,首先见于唐末五代之间的《四时纂要》。《四时纂要》说,“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回三尺,深一尺,……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摊……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壑泄水。水浸根必死。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茶未成开(时),四面不妨种雄麻黍稷等。……收茶子: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如此详实的记述表明,在唐代

到了唐代,霞浦已成为福州地区茶叶主要产区。《三山志》记载:“福州贡蜡面茶,盖建茶未盛前也。今古田、长溪近建宁界亦能采制,然气味不及”。唐代霞浦的茶叶因为制茶技术的原因,品质比福州作为贡茶的蜡面茶略差,但产量仍然较大。

霞浦赤岸村是唐代日本空海大师入唐学习禅宗茶文化因海上遇难登陆停留的地方,距今已有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公元804年,日本空海大师随遣唐使入唐,在海上因遇台风漂着长溪县(今霞浦县)赤岸以南海口,得到了民众的接待。美国威廉·乌克斯所著《茶叶全书》记载:“大同元年(806),僧侣弘法大师(即空海)又从中国研究佛法归去,亦对茶非常爱好,彼亦携多量茶籽,分植各地,并将制茶常识传布国内。”安徽农业大学陈椽教授所著的《茶业通史》记载:“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公元806年),空海弘法大师又引入茶籽及制茶方法。茶籽播种在京都高山寺和宇陀郡内牧村赤埴,带去的茶白保存在赤埴隆寺。”这两部文献都记载了空海大师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并传播茶树栽培与制茶技术。

明代,霞浦不但盛产茶叶,而且茶叶成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明代谢肇淞《长溪琐语》记载:“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茶。山丁僧俗,半衣食焉,支提太姥无论。即圣水,瑞岩,洪山,白鹤处处有之……亦与清源竞价”。当时霞浦茶叶由于

种茶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这样的记述绝对不能说明中国人种茶自唐代开始的结论。

中国茶树种植具体始于何时?准确年代显然不可考,但应该不会迟于魏晋时期。其实这个问题倒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自从有了人工种植,茶文化开始有了基点,开始有了积淀,开始像一条河一样从千年以前流到千年以后。

参考文献:

- [1] 邹明华. 专名与传说的真实性问题[J]. 文学评论, 2003, 06: 177.
- [2] 陈荣冰. 茶种的起源、演化与传播[J]. 茶叶科学技术, 1999, 01: 31.
- [3] 叶羽. 茶经[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43.